

【行走齐鲁】



巨碑无言，双城叠影

曲阜旧县村藏着的千年文明密码



□杜伯和

“曲阜城头望旧县，一碑一砖记千年。”曲阜人常说“三孔看儒风，旧县读沧桑”，这片被泗水河、洙水河、沂河滋养的土地，藏着古老的文明密码。出曲阜明故城，顺327国道东行3公里，便看到旧县村村头的“寿丘”石坊默然矗立，坊上题字遒劲如铁，仿佛刚从北宋的晨光中拓印而来。

作为祖祖辈辈扎根于此的旧县村人，我无数次踏过石坊后的青石板路，拾级进入寿丘公园。晨光里，两通巨碑被朝阳镀上暖金，16.95米的高度让周遭的松柏都显得谦卑，“万人愁碑”和“庆寿碑”正以沉默的姿态，诉说着曲阜“双城叠影”的千年往事。

寿丘湖东岸的“万人愁碑”又称“无字碑”，是我国现存碑刻中体量最大的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碑”，光滑的碑身映着流云舒卷，仿佛把千年风云都收进了留白里；而湖西岸的“庆寿碑”上，宋徽宗的瘦金体在光影中流转。村里老人常念叨：“寿丘两块碑，无字胜有字，一块记辛苦，一块藏兴衰。”轻叩碑身，沉闷的响声里，仿佛交织着运石农夫的号子、迁城的夯声，还有石匠低语与村民闲谈。这两通碑，是时光的坐标，更是文明的见证，目光穿越五百多年荒草，直抵北宋那座名为“仙源”的古城。

北宋大中祥符五年(1012)深秋，宋真宗赵恒的皇家仪仗踏过曲阜城东的黄土岗。他立于寿丘高地，北望泗水河如银带环绕，南眺少昊陵松涛阵阵，当即宣告：“此黄帝诞生之

地也，宜改县名，建祖庭，以彰华夏之源。”一道圣旨，让沿用千年的“曲阜”更名为“仙源”，县城也从鲁故城迁至寿丘。我的老家，恰在仙源城中心的鱼市口，是南北、东西大道的交汇之处，儿时玩耍时，还曾在老宅墙角见过刻着“仙源”二字的残砖，那是古城最后的印记。

仙源城东北处，曾矗立着北宋最盛大的国家工程——景灵宫。据《宋史·礼志》记载，这座供奉黄帝的宫殿“总一千三百二十区”。考古发现的主殿柱础直径达1.2米，比故宫太和殿的还要粗壮；残存的黄帝玉像残块，以莱州白硝玉石雕琢，专家推测整像高约5米，需数十工匠耗时五年而成。从我记事起，这块残石就躺卧在少昊陵神道南端。

这座南北长722米、东西宽540米的仙源城，藏着古人的文化野心。“十字轴线”布局规整，南“寿丘”、北“瞻峰”、东“崇文”、西“尚德”的城门命名，既尊黄帝祭祀的神性，又续儒家文脉的温润。东城设县衙掌政务，西城立县学传教化，城内水井的陶管排水系统与孔庙如出一辙。

北宋末年的寿丘，曾是何等繁盛。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》描绘道：“每岁正月，郡臣奉祀黄帝，车盖塞道，商贾云集，酒旗招展于十字街头，书声回荡于县学窗外。”这份繁华延续至宣和年间，宋徽宗决意打造四通巨碑，欲将“仙源”之名永镌史册。宣和四年(1122)，万名工匠围凿巨型花岗岩，这块长18米、宽4.5米、厚1.5米的石料，重达388吨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开采时“凿山为窟，遇石脉则焚以烈火，泼以冷水，令其自裂”，仅取料便耗时一年。

运碑更是工程奇观。工匠们铺就“滚木道”，木柱直径逾尺，推进极缓，民间《运碑歌》传唱至今：“一日行三步，三步一叩首，石过山和沟，石汗湿如酒。”所谓“石汗”，实为石料渗水与纤夫汗水的混合物，碑石孔隙中至今仍有盐分结晶，默默佐证着那段艰辛。石料抵达寿丘后，雕刻大师面临空前挑战：碑额需刻六条盘龙，要显“龙跃云津”的动感；碑身需打磨得“光可鉴人”，为宋徽宗亲定的瘦金书题字做准备。可彼时北宋已风雨飘摇，宋徽宗妄图以巨碑彰显“天命所归”，却未料靖康之变的烽火骤至。

建炎二年(1128)正月，金兵攻陷仙源城，曾两次遭“天火”重建的景灵宫又遭战火，“火五日不灭，取其金宝，碎其玉像”，即将完工的巨碑工程也戛然而止。碑身底部几道浅凿痕，相传是工匠促间试图推倒石碑，不使其落入敌手的痕迹。最终，石碑在废墟中静静躺了近九百年。我儿时和小伙伴割草拾柴，常蹲于碑座中间的凹槽内玩耍休息，如今想来，那竟是与千年历史的触碰和对话。

明正德六年(1511)九月，刘六、刘七农民起义军攻破仙源城。这成为迁城的导火索。明武宗准奏，正德七年(1512)迁城启动，而这十年建城史，实则是仙源城的“解体史”。

《曲阜县志·建置志》记载，明故城的砖石“半取于仙源旧城及景灵官遗址”。新城选址孔庙西南高岗，海拔高出七米以避水患，用“糯米灰浆”砌筑的城墙坚固如现代水泥。正德十六年(1521)迁城完工，西门碑文“迁自旧县”四个大字，让“旧县”成了仙源城的新名。

被遗弃的仙源城迅速衰败，景灵宫的石柱被拆去盖房垒墙，县衙和学堂遗址沦为农田，村民们耕作时常能翻出明代瓷片。两通巨碑则被遗忘在荒野，清代《曲阜乡土志》记载：“旧县有巨石二，不知何代物，牧童常登其上，碑隙生树，根盘石裂。”

“万人愁碑”的发掘更像一场考古探险。考古队员用3个月时间清理出140余块残碑，最大的一块重12吨，碑额上的盘龙纹清晰可辨，残块拼接后的弧度完美，印证了古碑仅是被推倒掩埋，而非炸毁。修复时，宋代工匠留下的榫卯记号成为“石匠密码”，让毫米级拼接得以实现；吊装16吨重的碑额时采用的“悬链线理论”，与北宋李诫《营造法式》中“重物起吊，必循弧线”的记载不谋而合，让人不得不惊叹古人的智慧。2002年，两通巨碑在寿丘公园重立，2010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：“这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石碑，更是人类对抗时间的见证。”后来文物部门在“万人愁碑”西侧发现带“宣和”字样的残片，更印证了宋徽宗与四通巨碑的历史记载，为这段往事补上了关键一笔。

站在少昊陵的万石山上俯瞰，西面明故城的青砖黛瓦与南面旧县村的绿树红瓦交织错落，两通巨碑如坐标原点，将千年历史压缩于这片土地。仙源城遗址以植被标示出城墙轮廓，与明故城形成“双城互望”的奇观。朝阳与夕照中，碑影延伸至寿丘湖对岸，湖水倒映碑身，仿佛时光折叠，北宋的玉阶金殿、明代的夯土城墙与当代游人的身影在波光中交融。

巨碑无言，双城叠影，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在提醒人们：文明从不是孤立的存在，它在战火中涅槃，在迁徙中延续，在普通人的守护中生生不息。

□张永红

济宁市金乡县西南部，有一个名为鸡黍集的村庄，现为鸡黍镇政府所在地。这个颇具特色的地名，源于“鸡黍之约”——一个诚实守信、重情重义的故事。

南朝史学家范晔所著《后汉书》中有一篇《范式传》，其中记载：“范式，字巨卿，山阳金乡人也，少游太学，为诸生，与汝南张劭为友。劭字元伯。二人并告归乡里。式谓元伯曰：‘后二年当还，将过拜亲，见孺子焉。’乃共克期日。后期方至，元伯具以白母，请设饌以候之。母曰：‘二年之别，千里结言，尔何相信之审耶？’对曰：‘巨卿信士，必不乖违。’母曰：‘若然，当为尔酝酒。’至其日，巨卿果到，升堂拜饮，尽欢而别。”文中介绍了“鸡黍之约”典故的由来。范式，字巨卿，东汉山阳郡金乡县，曾官至荆州刺史、庐江太守。张劭，字元伯，河南汝南人。范、张二人曾一起在东汉太学读书，成为同窗好友。在学业告成、即将回归故里之时，临别前，范式说：“两年后，我将去府上拜望尊亲。”张劭回答：“到时候，我一定会杀鸡煮黍，等待兄长。”两年后，约定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。一大早，张劭就忙碌起来，他对母亲说：“我的好兄长巨卿今天要来看望您，咱们杀了鸡，煮好黍米，等着他吧。”母亲说：“你俩分别已经两年，两地又相隔千里，你怎么能断定他今天会来呢？”张劭肯定地说：“巨卿是一个讲信用的人，我了解他，他说来就一定来的。”果然，就在当天，范式风尘仆仆，如期赶到张家。二人久别重逢，把酒言欢。

故事的后半部分颇具传奇色彩。几年后，张劭突然身患重病，卧床不起。而此时范式正在湖北担任荆州刺史，对此一无所知。忽有一日，范式夜得一梦。梦中，张劭对他说道：“巨卿，我将于某月某日死，某日下葬。”范式醒后，悲伤不止，马上告假，到张劭的家乡汝南奔丧。张劭即将下葬之际，范式身着白衣，匆匆赶到，为张劭执紼引灵。待墓冢修好，又亲手栽种树木，方才不舍地离去。

范、张二人，远隔千里，相期约会，又如期赴约，共结为生死之交。后人用“鸡黍之约”或“鸡黍之交”来形容这种忠义守信的深厚友谊，“鸡黍之约”也因此成为千古诚信的典范。“鸡黍之交”与管鲍之交、知音之交、刎颈之交、舍命之交、胶漆之交、忘年之交、生死之交，并列为古代形容真挚深厚友谊的“八拜之交”。

千百年来，“鸡黍之约”的故事被广为传颂，《后汉书》《搜神记》《喻世明言》《山东通志》等均有记载，历代文人对此也多有吟诵。明代诗人孙夔曾作诗曰：“我爱范张鸡黍风，明时俎豆汉时封。一千里外云和树，数十年间竹与松。”清代诗人李征育曾作《鸡黍城览古》：“翻云覆雨世情险，古道于今何有哉？美酝一堂佳客至，素车千里故人来。”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话本小说集《喻世明言》中有一篇《范巨卿鸡黍生死交》，更使“鸡黍之约”的故事深入人心。

为纪念这两位信义贤者，后人将范式出生的故乡范庄改名为“鸡黍集”，并在村里修建了“二贤庙”。古籍曾记载：“鸡黍城，在县西南三十五里，汉功曹范式故宅，以范张有鸡黍之约，故名。”相传东汉汉明帝为二人信义所感动，下诏重修二贤庙。重修后的寺庙又称“范张祠”，是一座独具建筑风格的“无脊庙”。因庙宇无脊，四周均用直扁椽，弯成牛梭头状，紧紧扣在一起，支撑起顶部，象征范、张二人携手并肩、永不分离；庙宇的墙体是空心的，象征范、张二人肝胆相照、心心相印。时至今日，重修于明成化年间的“无脊庙”建筑遗迹犹存，现为金乡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63年，在嘉祥县纸坊镇大鼎山发现了范式墓，此地东汉时曾属金乡县。范式墓中出土了很多文物，其中包括两方铸造精致的铜印，一方为“范式印信”，一方为“范式之印”，现藏于济宁市博物馆。同时出土的还有范式碑，碑文为隶书所写，是魏隶著名碑刻之一，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唐朝书法家李嗣真曾赞道：“蔡公诸体，唯《范巨卿碑》风华艳丽，古今冠绝。”清代国画大家黄易称此碑“体势森严，神味完足”。范式碑现仅存残石两块，藏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济宁铁塔寺的汉碑群。宋代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、清代翁方纲的《两汉金石记》等著作对范式碑均有收录。

范式、张劭“鸡黍之约”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，“鸡黍集”的地名沿用至今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『鸡黍之约』与金乡鸡黍集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